

THE NOSTALGIC WRITING AND HOME IMAGINATION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DUNGAN PEOPLE IN CENTRAL ASIA

中亚东干文学中的怀乡书写与家园想象



<https://doi.org/10.24412/2181-1784-2025-26-383-388>

沙莎

兰州大学文学院, 兰州 730000

Sha Sha, Ph. D. candidat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PRC
Email:shash2023@lzu.edu.cn*

摘要: 本文探讨了中亚东干文学中怀乡书写的具体表现、深层意蕴和价值意义。通过意象分析的方法, 进一步探讨中亚东干文学如何书写故乡, 并深入分析怀乡书写所蕴含的历史与文化意蕴。尤其是怀乡书写在表达乡愁、寻找精神家园、实现文化认同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有必要研究中亚东干文学中的怀乡书写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中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 中亚东干文学; 怀乡书写; 地理意象; 方言书写; 精神家园; 文化认同; 共同体意识

基金资助: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新世纪以来乡村小说中的返乡书写研究”(项目编号: 2025lzujbkyxs035) 阶段性成果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profound implications and value significance of the homesickness writing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Dungan people in Central Asia. By using the method of image analysis, it further investigates how the literature of the Dungan people in Central Asia depicts their hometown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contained in the homesickness writing. Especially, the homesickness writ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expressing nostalgia, seeking spiritual homeland, achieving cultural identity and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the homesickness writing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Dungan people in Central Asia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world literature.

Keywords: The Literature of the Dungan People in Central Asia; writing of nostalgia; geographical imagery; dialect writing; spiritual homeland; cultural

identity; sense of community

Funding: This research is a part of the project "Research on the Return to the Hometown Theme in Rural Novels since the New Century" (Project No.: 2025lzujbkyxs035)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of Lanzhou University.

东干族，这个在中亚大地上独具异彩的民族，有着波澜壮阔和饱含沧桑的历史。中亚东干族经由中国西北的回民，移民至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乡庄。东干族人在背井离乡和异居他乡的过程中，不断漂泊，又重新扎根。在地理空间的跨国界、跨地域的迁移中，多民族文化、语言、风俗逐渐影响着东干族人，由此形成了“多文化”“多语言”交汇互融的独特现象。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亚当地文化完美结合，在融合当地特色的同时，又保留了中国的传统生活方式与文化习俗，不断丰富自身的文化，使其成为丝绸之路沿线上的独特珍宝。

然而，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无论岁月如何流转，世界如何斗转星移，即使东干人身处中亚，但他们仍然没有忘记曾经的故居与家园，这在中亚东干文学书写中有着鲜明的体现。作为丝绸之路沿线上的中国与中亚三国，共同哺育了中亚东干文学，这种共同的文化与家园，使他们天然带有一种强烈的怀乡意识和家园想象，这种浓浓的“乡愁”与“乡恋”情怀逐渐渗透进他们多情、多感的文学书写中，显示着对故乡的深刻眷恋和对民族文化的执着传承。

一、怀乡书写的多元呈现

综观古今中外，故乡与怀乡，是人类历史上永恒的文学母题，承载着人类深刻的情感记忆和复杂的文化属性。无论是古老的《荷马史诗》所包含的人类返乡之旅，还是中国传统文学《诗经》《楚辞》蕴含的离散经验与感怀情绪，乃至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乡愁情怀，都不乏对故乡的书写，这些文学皆指向故土、亲人与家园等具体意象和精神想象。怀乡书写包含着对实体故乡的怀恋和对精神故乡的追寻等形态。正如王德威曾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中指出：“原乡的观念或关系个人追本溯源的欲望、或牵扯宗族法统的感召、或表现地域山川的特质、可谓众说纷纭，各有道理。”[王德威 1998: 245]中亚东干文学因其在地理上的特殊迁移，和在文化上拥有共同的文化母体，其怀乡书写呈现了多元而丰富的形态。

地理意象建构的实体故乡。中亚东干族最初来源于晚清移民中亚的中国陕西、甘肃的回族人民，因而中国有着他们实在的存根之所。在其文学创作

中，不乏中国的地理意象书写。在自然意象方面，他们或寄托于山川河流，或寄托于花草树木，使自然地理意象构成情感的载体和依托。如亚瑟尔·十娃子在《黄河的水》中直抒胸臆：“黄河的水，日夜流，流进我的心里头，我的乡愁。”黄河作为中国的母亲河，被视为生命与家园的象征，孕育了华夏文明。黄河之水如作者心中的乡愁，永不停息，作者将自然地理意象与浓厚情感紧密结合，强化了作者的怀乡情感及其感染力。天山作为中亚东干人与中国的天然“屏障”，成为他们“故乡”与“居乡”的界限，也成为他们想象故乡的“屏障”，他们在文学作品中想象着天山另一边及其祖先们的生活。

城市地理意象也频繁出现在中亚东干作家笔下。十娃子在诗歌《我爷的城》中写道：“百年之前离别哩/我连银川。//我也没说：——你好在，没说再见……”[常文昌、常立霓 2014：212-213，以下凡引文皆出自此版本，不再一一标注]银川既是“我爷的城”，也即“我”的故乡和根之所在。作者遗憾地感到未与其故乡银川说“你好”与“再见”，寥寥几句，道尽自己与故乡银川千丝万缕的联系，那魂牵梦绕的、剪不断的“地缘”与“血缘”之情，显示着作者与故乡之间难以割舍的精神纽带。在《给陕西的信》《唱银川》等诗歌中，也有诸多体现。不仅如此，十娃子时常在诗歌中书写祖辈曾经居住的乡村之地，想象祖辈的生活场景，突出故乡的生命力及其孕育之力。伊玛佐夫也在诗歌《一把亲土》中，怀念“祖一辈”曾生存过的地方，书写伊犁、银川、兰州的山河与红花绿草，故乡风景在其笔下是美好而清秀的，对故乡的想念、牵挂及其对往昔时光的追忆之情皆溢出文本。

“乡庄”建构的精神故乡。中亚东干作家不仅以自然地理意象和城市地理意象建构实体故乡，使其乡愁有所依托，而且以“乡庄”想象一种精神的故乡，超越实体故乡实现精神的升华与超越。如十娃子在《营盘》中写：“我在营盘生养哩，/营盘呢长，/在营盘呢我跑哩，连风一样。/营盘呢的一切滩，/一切草上/都有我的脚踪呢。/我咋不想？”“乡庄”作为中亚东干人的“第二故乡”，是见证他们生长的地方，这种生于斯长于斯的怀恋与感恩深深萦绕在作者们心间。在《我的乡庄》中，十娃子将“乡庄”视为“我的亲娘”，在如母腹般的乡庄里，安稳又踏实。生活场景作为故乡的情感聚集地，使故乡更富实感和动态。中亚东干作家在书写故乡时，往往聚焦于在故乡的生活场景和细微点滴，包括亲人的田间劳作或与亲人的往昔温情时光，亦包括辛勤的身影或质朴的笑容等，这些让人为之动容。他们不断走向故乡，也在超越故乡，在笔触中留下深刻的乡愁印记、故土深情和家国眷恋。

中国西北方言建构的语言和文化故乡。语言所携带的交流与文化意涵也

具有重要意义。中亚东干人仍保留着部分中国西北方言，以中国陕甘方言为基础，即使在岁月长河的流淌中，仍然没有忘记他们的母语。在文学创作中，口语化的助词，如“……的呢”“……哩”都是传统中国西北方言中惯用的说话方式，还有一些独属于中国西北的方言词汇和发音也被保留下来，这一极具声律美感的重叠复沓，成为其文学创作可供识别的独特表达方式和美学风格。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母语和说话习惯，使其文学建构了一种中国西北的活态方言故乡空间，丰富了其文学的表意方式。语言和语音所拓扑的情感与文化意义，拓展和超越了文字本身的意义，从而为怀乡书写赋形和赋意，使书写内容与书写形式相耦合，建构了一种“言文一致”的“有意味的形式”。更重要的是，经由方言的加入，实现了多元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乡音所承载的民族文化记忆，确证了个体与故乡的深切情感联结与文化关联，体现了中亚东干人与中国故乡共同的文化基因，及其血脉联系与承续，归属与认同。从未改的乡音中，足以观视中亚东干人的迁移历史和文化血脉。如果说在当今急速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的乡音在逐渐文明化，那么中亚东干人对乡音的保留亦是对中国传统方言及其文化的传承，在乡音里不断留住乡愁。

二、怀乡书写的深层意蕴

故乡并非不言自明的概念。它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实体存在，也是寓意丰富的情感机制、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在中亚东干文学书写中，故乡不仅是寄托情感的具身意象，更是一种被再造的象征符号，不断被意义和价值再编码。

情感慰藉和心灵寄托。在“他乡”的生活中，中亚东干人或许面临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和文化差异等困境，怀乡将成为他们寻找与实现精神慰藉与寄托的力量与安慰。温情的文字、往昔的时光、亲人的温暖等，都付诸其笔下，让他们漂泊与迷茫的心灵寻到安顿与依赖。通过文字，他们得以与故乡进行心灵的对话，在单纯和友爱的情感伦理中，营构感人至深的情感氛围和真切表达。

中亚东干文学经由亲缘、血缘与地缘书写的结合，彰显其寻根意识与家园想象。在其怀乡书写中，对故乡的呈现和地缘意识往往伴随着对祖先、亲人的怀念，不仅多以母亲比拟故乡，如在《给母亲》《好吗，阿妈》等诗歌中，皆将故乡称作“母亲”“阿妈”。而且提及故乡，也往往强调故乡与祖辈的联系，尤其强调故乡是“爷爷”“奶奶”曾经扎根的城市，如《北河沿上》：“我爷、太爷都住哩/北河沿上，/我也在这儿住的呢，/孝顺老娘。/就是，北河我的家，/我的母亲……”还如作家十四儿在《回族》中写：“咋也巴望血管呢我

的祖辈, /给我一回添给哩/把‘回’血脉。”对“根”的追寻溯源到祖辈, 在这种特殊的亲缘、血缘与地缘的紧密相连与互相强化中, 加强了情感的抒发和文化的蕴藉。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 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费孝通 2004: 101]

在中亚东干文学的怀乡书写中, 对归属感和“根”的追寻, 表征为他们对故乡的深情呼唤。十娃子在《回家》中, 呼唤着“回到回的地方上, 我不忘掉, /把你, 心里的估价, 把你的好。”曼苏洛娃在《喜爱祖国》中向祖国深情告白: “我想你哩, 祖国呀, 天天思量……”他们皆在文字中寄托乡愁, 通过“纸上还乡”的方式, 唤寻故乡和祖国, 饱含热泪地诉说着对祖国的赤诚热爱。这种寻根意识和家园想象也是对身份焦虑的纾解, 在地域认同与血脉相承的寻绎中, 实现精神上的返乡和落叶归根。而几代人的时间与空间相隔, 也在文字中表征为空间依恋与时间追忆, 在时空的张力中, 亦是对历史记忆和民族记忆的铭刻。

中亚东干文学也体现着对中国文化认同的追寻。在历史文化方面, 其文学作品中常出现中国的历史传说, 如立尔·尔不杜的《三娃儿与沙燕》以《梁山伯与祝英台》为题材, 十娃子的《长城》以《孟姜女哭长城》为背景, 都是对中国美好历史传说的转化与再创造。在传统文化习俗方面, 也常涉及中国的传统节日和习俗, 如诗歌《给屈原诗人》中书写了端午节场景等。以此种种都显示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赓续, 以及多种文化之间的互嵌。

更重要的是, 中亚东干文学的怀乡书写没有停留在对故乡的单一怀念, 而是实现了一种“共同体”的书写, 是一种美好情感的寄寓与向往, 提升了精神境界, 也拓展了文化的深度与广度。十娃子在《给陕西的信》中, 祈望着: “我想睡在渭河边, /脚手伸长; /星星月亮和太阳, /把我照上。//在我心里总指望, /不断来往; /两边回汉兄弟们, 地久天长。”在《歌唱你, 营盘》中, 歌颂“民族之间团结紧, 兄弟姐妹带文明”, 彰显了东干人的团结与进取精神, 激发了扎根内心深处的民族情结与中国情结。王立在《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原型与流变》中就指出: “思乡, 不光是怀念故国父母家园等实体, 更重要的是人类群体生活意识、经验强烈而顽强的表现; 它是人要以归依诚信方式实现自我与社会要求的努力。”[王立 1990: 249]这种将怀乡情结与民族交往相结合的意识, 超越了以往执着于故乡的浪漫乌托邦式书写, 将“家”与“国”视为一体, 提升至家国意识与共同体意识, 丰富了怀乡书写的模式与意涵。

三、怀乡书写的值与意义

中亚东干文学中的怀乡书写颇具精神意蕴。在中亚东干文学的历史发展中，怀乡书写是其不可割舍的部分，在寄托情感、寻找共鸣和强化民族认同方面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成为一种情感的出口和精神的支柱。在他们的深情和极具韵律的文字中，得以重温故乡风景和往昔时光，以文字慰藉心灵、穿越时空，返回那片陌生又熟悉、遥远却温情的故乡大地，寻绎属于心灵的归属和记忆。对本族人而言，怀乡书写也为赓续民族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方式，在代代相传的书写中，铭刻了百年东干人的迁徙史、情感史和生活史，记录历史的变迁、生活的迭代和情感的转向。

在世界怀乡文学中，中亚东干文学的怀乡书写独具异彩，成为跨文化文学研究的独特样本。其怀乡书写以跨国界、跨文化、跨语言等多元特征构成了世界怀乡文学的珍宝，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其所涵纳了中国文化、俄罗斯文化、伊斯兰文化，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碰撞、交流，构成文化迁移、文化认同等重要研究命题，也提供了在不同文化之间寻找调和与平衡的样本。同时，怀乡作为人类共有的情感机制，中亚东干文学中的怀乡书写与当下中国文学中的怀乡书写，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怀乡书写所涵纳的情感与精神有共同之处，都在探索人类的精神困顿和寻找人类共有精神家园的道路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关注着作为个体的“我”和作为人类的“我们”从哪里来、将要到哪里去的哲学问题。

尤其在当下“一带一路”倡议中，中亚东干文学的怀乡书写对多民族、多国家的语言、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为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和交流提供了通道。其书籍的阅读将带动经济的发展，文学的互动将促进文化的交流，理论的批评与建构将进一步推动深层文化与精神的互动，从而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参考文献：

- [1] 杨建军.论中亚东干文学的家园意识[J].外国文学研究,2015,37(02).
- [2]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M].北京：三联书店，1998.
- [3]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 [4] 王立.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原型与流变[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
- [5] 常文昌、常立霓.世界华语诗苑的奇葩——中亚东干诗人十娃子与十四儿的诗[M].银川：阳光出版社，2014.